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东亚同文书院研究

Dongya Tongwen Shuyuan Yanjiu

郭 晶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东亚同文书院研究

Dongya Tongwen Shuyuan Yanjiu

郭 晶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同文书院研究 / 郭晶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61-8986-3

I. ①东… II. ①郭… III. ①海东亚同文书院-史料②中日关系-研究-近代 IV. ①G649.299.51②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606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王 影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193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1900 年，由日本外务省资助，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南京创设东亚同文书院，旋即因为义和团运动迁往上海，后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直至 1945 年日本战败，东亚同文书院作为两个间谍机构之一被勒令关闭，部分教师回到日本，在爱知县丰桥市创立爱知大学。

东亚同文书院从日本国内招收学员超过 5000 名，在中国学习三到五年，因此学员汉语水平普遍比较高。为了获得有关中国的情报，书院利用每年毕业大旅行，创设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大旅行调查。即：学校提供资助、安排路线、指导调查方法，学生自行组织，以旅行的方式，对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风俗进行系统的实地资料收集，报告采取《大旅行志》的方式提交，同时保存相关的日记、日志、原始资料、票据、图片和实物，囊括 700 多条线路，前后共计 41 年。

笔者有幸在爱知大学求学一年，临行前承蒙导师指点，对东亚同文书院有所了解，但至亲见如山史料，虽然才疏学浅，也感到东亚同文书院在中日交流史上的地位远非目前认识之十倍，研究之价值万万不可小觑。

首先，东亚同文书院在中国存在时间之长，规模之稳定，较之中国大多数的大学，绝无逊色。从 1900 年在南京设立，旋即因义和团运动迁往上海，至 1945 年日本战败，东亚同文书院共计招生 46 期，学生总人数超过 5000 人。校址虽然几经周折，但学校规模，学生与教员数量一直保持相当稳定。

其次，东亚同文书院为了侦查中国现地实情，以旅行为掩护，以实地调查为目的，对中国进行了 41 年、700 多条线路、5000 多人参加的大旅行调查。

再次，东亚同文书院对于大旅行调查的资料重视之程度，保存之完整，堪与政府档案媲美。对于 1937 年之前的材料，作为大旅行调查的报告材料保存得十分完整，而且个人在大旅行调查中的日记、游记也都尽可能地保存

了下来。

最后,东亚同文书院不仅仅致力于实地的调查,更把调查的材料整理成集,分门别类。前后出版的文集不下百余种,其中,尤以12辑《支那经济全书》、18卷《支那省别全志》和9卷《支那省别全志续编》三部巨著扬名一时。^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谷光隆、藤田佳久为首的日本学者对一部分材料进行进一步整理,先后推出了有关鸦片问题集成报告书、大运河集成报告书、四卷本大旅行调查路线研究。2006年是东亚同文书院的继承者爱知大学成立60周年大庆,爱知大学更是出巨资整理《大旅行志》34卷。

中国学者有关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专著目前尚属阙如。有关的学术论文包括:黄福庆(台湾“中研院”研究员)的《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中第一章第三节第一小节对此有所介绍,但限于篇幅,考察的内容相当有限,小巧文章,谈到书院的结构、特色、发展历程均有过人之见解,如:成立之处各县选派学生之周折;入学之初游历日本之影响;学校资金来源影响学校旨趣;办学进程中政界的介入;学校课程科目;尤其是提出

^① 以《中国经济全书》为例,《中国经济全书》是东亚同文书院的早期调查集成。据东亚同文会的“编辑绪言”称,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历经数年,先后参加调查的人数达200余人,原稿达2万页以上,从中选择成书出版的约1万页。指导调查和总其成者,是著名学者根岸佶。1907年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分作4辑,每辑又分若干编,第1辑7编,主要涉及农政、手工业、工业、资本家、物价、人民生活、财政等事项;第2辑6编,主要涉及商贾、特许商(盐商、茶商)、买办、会馆公所、行规条约、家规店规等;第3辑5编,主要涉及旧关(常关)、新关(海关)、水运、仓库、山西票庄等。第4辑4编,主要涉及商政、商品陈列场、商用书式、商用账簿等。明治41年(1908)又出版8辑,每辑的序号仍然续前。第5辑2编,为铁道总论、铁道分论;第6辑6编,分别是邮政、电信、度量衡、货币、支那银行、支那的外国银行;第7辑8编,分别是海上保险、商帮、牙行、报关行(包括渝行与通关所)、招牌、广告、商标、列国对清贸易;第8辑7编,分别是农业、米、麦、豆(包括豆饼与豆油)、砂糖、棉花、脂肪油与蜡;第9辑2编,分作畜牧(含牛骨、皮货、制革等)和海产;第10辑3编,分作木材、木炭、矿山;第11辑7编,分别是一般工业、磷寸(火柴)、造纸业、精米业、制粉与制面、纺织业及棉丝、棉织物;第12辑6编,分别为制丝业、绢织物、陶瓷器、出版业、文房用具、杂货。在12辑之外,另附有《支那交通全图》。《中国经济全书》所汇集的资料,有的来源于实地调查。有的是文牍档案典章的直接移录,有的是从相关资料中采摘综合。就三种资料的来源形式来看,实地调查和采摘综合的资料最具价值。另外的两套资料,在资料丰富翔实方面更有过之,不过《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主要针对西部地区的省份,对于东部中部没有总结。但是《支那省别全志》则将内地十八行省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了有关大旅行调查的问题，可能是汉语界率先关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周传喜对东亚同文书院的发展历程也有撰文，分别是《东亚同文书院始末》、《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上海创办的学校述论》，对于东亚同文书院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地位有所探讨。

上述两位学者对于东亚同文书院的介绍，都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性贡献，但是，主要采用东亚同文会编著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为基础，对于同文书院的一手材料未曾涉及，这也促使笔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中国学术界对于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还有一些成果，如冯天瑜先生主持的《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第一本就是选译了有关的大旅行记录，因为这些记录“具备了特殊的历史学、社会学价值”。

日本学者因为语言优势，对于一手材料使用比较普遍。首先是谷光隆，他在爱知大学担任教授期间，编辑整理了两本专题性的资料汇编，一本是《支那的阿片调查》，另外一本是《东亚同文书院大运河调查报告书》。在浩瀚的调查资料中，以此二者为主线，在20世纪科技尚未惠及学术研究的时候，谷光隆先生花费的精力远远超过普通的资料汇编。这两部专书编成以后，在日本学术界引用的比例很高，但是却没有以此为研究对象，深入到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中去，实为可惜。栗田尚弥在整理《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之余出版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由点及面的方式展现了大学之部分风貌；西所正道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风云录》，关注中日两国的关系，对于大学本身的研究略有分歧；山本隆的《东亚同文书院生》再现了自己在华10年的经历，史料价值尤其重要。日本学界的有关论文也不下20篇，主要收录在爱知大学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纪念中心的杂志——《同文书院纪念报》中，目前一共出版了14期。

在东亚同文书院研究中，贡献最大的日本学者，当属目前仍在爱知大学任教的藤田佳久教授。他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编写了四卷本以大旅行调查路线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中国との出会い》、《中国を歩く》、《中国を越えて》、《中国を記録する》。在此基础上，他的《東亜同文書院中国大調査旅行の研究》于2000年问世，是目前唯一一部有关大旅行调查的专书。而他解说的《東亜同文書院中国調査旅行報告書：附録大旅行誌》，是目前爱知大学有关东亚同文书院材料的指导性目录。

藤田佳久先生从地理学的角度，对于5000多名学生对中国的调查进行

了系统的整理,按调查路线区分,运用完整的档案材料,收录了大量的原始史料作为分析的对象,虽然收录的部分和整体的史料相比还只是很小的一个比例,但是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如第二章收录的《兰州纪要》、第三章收录的第二期生波多野养作的调查旅行日志、第四章的《西域地方事情》、第五章的福建沿海追踪调查、第六章关于四川、陕西、山西的地域调查报告及图表,都相应说明了一些研究的问题。

还有薄井由女士的硕士论文《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涉及的方面非常多,并且作者不辞劳苦,在上海留学期间,利用回日本探亲的短暂时间,采访了健在的东亚同文书院学生,以口述史的方式,保存了珍贵的一手史料。

笔者还希望通过介绍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的报告书、大旅行日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整理的专书,方便中国读者和研究人员了解东亚同文书院(大学),进而认识近代日本对华态度。东亚同文书院的大旅行调查结论性资料,主要集中在20世纪的前30年,由日本外务省资助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维持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实地调查,直接的文献有:《支那经济全书》(台湾影印出版时更名为《中国经济全书》)、《支那省别全志》(台湾影印出版时更名为《中国省别全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而未整理的资料大概是这些资料的十倍以上,笔者只能宝山选宝,尽可能地把未整理的资料集中在研究的几个方面之内,而很多宝贵的资料必然因为研究的内容有限而不得不放弃。

此外,东亚同文书院还有大量的专题调查报告书,前文已经有所介绍。到了20世纪末,日本学者又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如有关鸦片问题的资料集成,有关大运河问题的资料,都作为专书出版。

以上仅仅是资料来源方面,资料本身还有深层的意义。一方面,这批资料从外部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的一面的观察,因为观察者自身的文化与被观察的文化具有相当的异质性,才能最大可能反映出我们自身生活于其中而不自知的文化根基,这无疑也是近代外来团体对于中国进行调查给予中国文化内省最大的贡献。在这个层面上还有一个很小的原因,就是日本人在调查过程中仔细和认真的风格。三套调查宏著,数据虽然有些错误,但是总体上是可信的、真实的,在征引文献资料的时候,也实现了考证在前、勘验在后的原则。这也是我在日本的生活中亲身体会的,一位中国友人在日本道路调查局工作的时候,发现日本的道路调查,连路边的每一棵

树的位置都有非常准确的统计。

另一个层面，日本对中国的传统和当时的国情又有一定的认识，由于东亚文化的某些共生性问题，可以避免文化优越主义的同情认识或者完全错误认识，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实际的情况会更加复杂，但是，本书对此将展开比较细致和具体的分析。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强调在历史背景下来看待东亚同文书院的产生、发展，最终关闭的过程，即基于日本 20 世纪初复杂的国内政治背景：军国主义的抬头、泛亚细亚殖民主义的兴起；同时，本书也关注中日由于文化相近所带来的中日友好的交往意愿。因此，本书在坚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上，对于日本对华友好的一面、日本内部的反战情绪有一些客观的介绍和评价。

中日关系在 21 世纪初的几年里，出现了重大的反复，一度落至谷底。战后的日本不愿意重视近代中日政治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避开这个尴尬的问题，导致一系列相关的研究都停滞不前，甚至包括近代中日民间往来、半官方往来的研究也受到影响。而中国国内学术界，在强调中日近代政治、军事、外交关系的研究上，投入的关注过重，同样忽视了近代中日民间、半官方交流的研究。本书在现实意义上希望打破原有的单一领域、单一观点，能在这个领域有所贡献。

第一，不再把东亚同文书院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来看待，而是放到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放到 20 世纪史中来看待学院的演变和命运。

第二，在基于大旅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大旅行调查背后的调查方法、调查者的主体性认同问题，是本书和后续的文章中将要讨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笔者期望在研究中，将政治史作为基础，融合经济社会史、教育史研究，而不是简单地为东亚同文书院作传，相反，希望从这个研究中，更多对 20 世纪的中外交通整体状况，对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研讨。

本书通过分析 20 世纪初跨文化交流的一个案例，希望对于正确认识中日关系史，尤其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有必要深刻、理性、力求真实地认识这一段历史。

本书由四章组成。

第一章介绍成立东亚同文书院的机构——东亚同文会，以及东亚同文书

院相关的时代背景，以及东亚同文会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章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尤其关注于上海作为东亚同文书院所在地给予其的影响，以及日本对华侵略对于学院命运之决定。

在整体介绍以后，第三章分专题谈东亚同文书院的特色，院长（校长）、教师、学生和毕业生如何活跃在历史舞台，以及相关重要事件。

第四章专论东亚同文书院与中国的关系。集中在中华学生部和支那研究部两个问题上。

在此基础上，余论部分讨论了东亚同文书院如何选择自己与中国的主客体认知问题，以及其认识中国的态度和动机问题，试图解答为何由“友善”着手，却以“帮凶”而终的疑问。

目 录

第一章 东亚同文书院的筹建准备	(1)
第一节 东亚同文会及其时代	(1)
一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思想界	(2)
二 东亚同文会的成立	(6)
三 在东京的跨国教育试点——东京同文书院	(13)
第二节 东亚同文书院成立前日本人在华调查机构的创设	(18)
一 岸田吟香的“乐善堂”	(18)
二 荒尾精在汉口开设的“乐善堂分号”	(20)
三 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建立	(22)
四 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惨淡经营	(26)
五 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成绩和影响	(30)
第三节 东亚同文书院的建立	(32)
一 东亚(南京)同文书院创设的准备	(33)
二 南京同文书院成立	(37)
三 建立之初的三次动荡	(38)
第二章 东亚同文书院的兴衰	(44)
第一节 成长时期(1900—1914)	(45)
一 新至上海	(45)
二 立校之初	(47)
三 丰厚的学生待遇	(48)
四 办学条件的提升	(50)
五 战火波及	(51)
第二节 全盛时期(1915—1932)	(53)
一 徐家汇校舍	(53)

二	农工科的兴废	(57)
三	黄金十年中的几次庆典	(58)
四	1930 年大罢课事件	(63)
五	战火重燃	(65)
第三节	战争时期 (1932—1945)	(70)
一	靖亚神社	(70)
二	1937 年淞沪会战前后的书院	(72)
三	大学升格	(74)
四	战中办学	(76)
五	战败停学	(79)
尾声: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继承 (1945—2006)	(81)
第三章	东亚同文书院的众生相	(86)
第一节	东亚同文书院的院长	(87)
一	根津一	(87)
二	杉浦重刚	(89)
三	大内畅三	(90)
四	本间喜一	(93)
第二节	东亚同文书院的教师群体	(94)
一	初期教师阵容	(95)
二	全盛期教师阵容	(98)
三	后期教师阵容	(103)
第三节	学生及其生活	(106)
一	学生来源	(106)
二	校园生活	(110)
三	左翼学生运动	(114)
第四节	毕业生	(120)
一	毕业生的总体情况	(120)
二	毕业生的众生相	(122)
第四章	东亚同文书院与中国	(129)
第一节	中华学生部	(129)
一	顾虑重重的办学之路	(130)
二	风波迭起的 20 年代	(131)

三 濒临关闭的退学风潮	(133)
四 中华学生部的毕业生	(134)
第二节 支那研究部	(137)
一 创设要旨	(137)
二 支那研究部的职能	(138)
三 《支那研究》的发行	(139)
四 物产馆	(142)
第三节 东亚同文书院与中国 20 世纪初的教育业	(143)
一 东亚同文书院教师与中国教育	(143)
二 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与中国教育	(146)
余论 东亚同文书院及日本与近代中国	(149)
附录	(156)
附录一 东亚同文会会长、副会长和干事长一览表	(156)
附录二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历任校长和校舍变迁	(157)
附录三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每年通行惯例	(158)
附录四 大旅行调查编年纪事	(158)
参考书目	(163)

第一章

东亚同文书院的筹建准备

东亚同文书院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现象。要实现这样一个庞大的教育计划，需要相当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影响，这就使人们不禁关注隐身幕后的主办者——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何要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建立一所规模宏大的教育机构？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要了解东亚同文会，不得不对日本 19 世纪后期，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想的急剧转变作一专门的说明。可以说，从“东亚认识、同文理论”到东亚同文会，再到东亚同文书院，三者所蕴含的是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东亚认识、同文理论”植根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急剧变化所带来的思想革新；东亚同文书院在实践的最前沿；东亚同文会作为媒介，甚或更接近于康德“感性—知性—理性”中的“知性”而存在，处于理论和实践的交织与迂回中，又在不断调适（或创新）整个理论。因此，远离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思想界、遥控校方的东亚同文会，不仅和这所大学的命运息息相关，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由此放眼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中去认识三者及其相互关系，这或许才是关心中国与日本以及整个东亚过去、现在和未来命运的最终旨趣所在。

第一节 东亚同文会及其时代

自西风东渐以来，不仅是东亚朝贡体系的核心——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这个体系的一员的日本（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在朝贡体系属于半边缘结构），不仅要在欧风美雨中“开国”，而且“迟早

必然同近代以后也发挥作用的朝贡体系全面展开对抗”^①，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年代中，沉默了十多个世纪以后的日本，终于迎来了一个思想的全盛时期。

一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思想界

认识日本思想的过程中，简约地归纳前明治时期是东方文化，后明治时期是西方文化，是一种极不科学的方法。事实上，文化在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是时间上的延伸，一个是地域性延伸，两种延伸都绝对不会有非此即彼的边界；在时间维度上的延伸，文化变迁的速度不保持匀速；在地理延伸的标尺中，以“联系”来维系文化的“延续”性。以此，从西方视野而脱离东方文化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它既不属佛教，也不属儒教。它是一个日本体系”。^②

深入到明治时期，这一时期主流思想指向是“脱亚入欧”。但是，“脱亚入欧”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常常被误读，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福泽谕吉的早期著作中，通过对于文明的相对进步，有很多基于理性地对待文化变迁的怀疑：“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本诸人道，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③对于“入欧”，福泽谕吉的积极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并不认为欧洲的历史进程就必然都是值得日本学习的，例如他使用调侃式的方式假设日本的宗教改革家亲鸾上人^④生活在基督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时代的德国，那么对亲鸾上人的评价不会是鄙夷轻视，而一定是崇高而完美；让马丁·路德调换一个时代和文化氛围，比如生活在相对落后的日本，那么由于宗教改革引起的血腥镇压、生灵涂炭，一定会被作为宗教改革的恶果广为宣传。福泽谕吉因此告诫读者：“本来仰慕西洋文明，择其善者而效之是可以的，但如这

① [日]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② [美]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③ [日] 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页。

④ 亲鸾上人针对佛教净土真宗的重大改革，强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不讲求对艰深佛学教理的钻研和个人长期刻苦的修行，受到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欢迎，因而使佛教在日本广为流传。

样不加辨别地轻信，就还不如不信。”^①

作为思想转型期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的思想体系也相当复杂，如果局限于他的某一部分著作，很容易误解或者扭曲对他的认识。譬如他的代表作《劝学篇》中的第四篇《论学者的职分》^②：“政府是日本的政府，人民是日本的人民……国民与政府的力量亦能平衡，才可以维持全国的独立。”作为福泽谕吉“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③观点的延伸，这个论点不仅区分了国家与政府，而且似乎力图说明人民、政府和国家三者的关系。^④然而实际上，福泽只是想说明学者协助政府的途径不需要通过参与政府做官，而是应该在政府之外办理私人（营）事业，这才是福泽支持的学者协助政府完成独立（实际上指的是国家的富强）的正确途径。由此可见，他在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的同时，尤其是他早期致力于启蒙思想的经典著作中，很多近代政治观念仍然在消化过程中，尚未能转变为自身思想之一部分。

明治时期的思想界不仅在发育，而且也在分化。在众多思想流派和趋势之中，国家主义、民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略占主流。

植木枝盛是自由民权主义的思想代表，自由民权运动在明治时期的主要目标是开设国会，由臣民向国民过渡。但是自由民权主义“并未涉及市民的自由和权利这一核心观念”，而是以“爱国”作为思想价值的终极目标，力图宣扬的是“以国家观念为主导的个人的自由主义”^⑤。因此，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思想界和社会之中，传播的是近代民族国家概念，从这

① [日] 福泽谕吉：《论怀疑事务与决定取舍》，载氏著《劝学篇》，群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9页。

② 参看《劝学篇》第四篇。这篇文章同时引发了加藤弘之（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教育家、政治学家）、森有礼（日本第一任文部大臣，日本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外交家）、西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等人的反驳。

③ 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对“个人独立，家庭独立，国家独立”的观点有惊人的一致，包括西周、中村正直、津田真道、箕作麟祥等。参见张艳茹、邹晓翔《论日本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以〈明六杂志〉为中心进行探讨》，《日本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在福泽谕吉这篇文章发表数年之后，明治十二年（1879）4月，民权运动重要领袖植木枝盛明确提出了“国家是民众的集合物，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构”。[日] 植木枝盛：《民权自由论》，吉野作造编《明治文化全集·第5卷：自由民权篇》，日本评论社1927年版，第184页。

⑤ [日] 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0—51页。

个意思上，民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毫无疑问地落入了国家主义的窠臼。

国家主义对于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像幸德秋水这样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堪称日本社会主义的领军人物，在著作中也要不断声明“社会主义同他们所说的国体——两千五百年一贯的皇统，当真有矛盾冲突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必须坚决给予否定的回答”，“能够采取社会主义的帝王和国家，比较那些依靠富豪的帝王和国家，要强盛的多，社会主义并不是非排斥帝王不可的”。^①

国权主义的思考方式和利益决定模式，也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对于东亚局势的观察，既取消了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可能，又因为日本尚不具备成为大国而对潜在或实在的大国心存戒备。

被视为东亚同文书院三位奠基人之一的荒尾精，被尊称为“东亚先觉者”，对于东亚格局的演变，内心的矛盾和犹豫跃然纸上：

应当救中国于未亡……使他振兴，以强我之唇，固我之辅，筑起实现兴亚大业的基础。……中国富强以后而欲反噬时，不仅不能使我国持唇齿目足之势而展振兴东亚的大志，而且会使我国本欲抑制英俄的强横反而将强大于英俄数倍的敌人设于一衣带水的对岸。本欲图东亚的兴隆与和平，反而招致骚乱与危亡。这不是值得着眼大局、思国家百年的长计者深谋远虑的重要问题吗？^②

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围绕朝鲜问题的“壬午兵变”、“甲申事变”发生以后，在日本“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不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亚细亚主义者，他们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优先考虑的都是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亚洲的整体利益（当然，少数古典亚细亚主义者如樽井藤吉、曾根俊虎等人除外）。在这种情形之下，民间的亚细亚主义往往被政府所推行的大陆政策所利用”。^③

① [日]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与国体》，收入氏著《社会主义神髓》，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1、53页。

② [日] 荒尾精：《对清意见》，转引自[日]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8—289页。

③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9页。

在国权主义向军国主义的过渡中,日本所谓的“保全清国”,是“用来束缚其他帝国主义者手脚的一种手段、方法,以使日本这一个后起的殖民国家,能在积聚力量之后,跟其他殖民国家较量,而不是真正想要保全大清帝国”。^①

这种模式对于这一代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至于决策者长期强调日本的自身安全,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就是一例。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在回忆面见西园寺公望时,这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对于建立“满洲国”充满了忧虑:“如再从满洲跨出一步,就将危及日本的国家基础。”^②

就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民的反战情绪,很多也都植根于关心日本国家自身之安危。如伪满建国大学的藤田松二教授曾提出:“请把满洲、台湾等地还给支那人,把朝鲜还给朝鲜人。如果那样做的活日本也不会灭亡。”^③

丸山真男在总结明治维新的贡献时指出:“明治维新是通过一君万民的理念,排除介于国民与国家政治秩序之间的障碍、打开民族主义发展轨道的划时代的变革。”^④民族主义向国权主义的发展,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支持,但是,国权主义再深入思想界的方方面面时,却未能找到理论的出口。时代缓缓地前行,从来没有等待。因此,在还没有弄清楚“日本应该在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上使自己变成‘强国’,变成‘一流国’,成为‘伟大的民族’”^⑤的思想混沌之中,一系列关心东亚问题的组织已经呈现出来,最终整合为东亚同文会。

胡适在1938年发表《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时,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潜伏在这种移植现代化之下的危机:

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很重大的不利之处。日本领导人的较早时

① 汪向荣:《日本教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② [日]驹井德三:《去大陆的悲愿》,转引自[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三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15页。

③ [日]水口春喜:《“建国大学”的幻影》,董炳月译,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④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80页。

⑤ [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